

鄭和下西洋與〈羅茲地圖〉

廖大珂*

英國學者孟席斯最近出版《1421年：中國人發現美洲》⁽¹⁾一書宣稱：由洪保所率領的一支鄭和船隊，曾抵達澳洲西南海岸，對沿海地區作了勘探，製作了地圖；另一支由周滿率領的鄭和船隊則在澳洲東南海岸登陸，對澳洲東部和北部沿海地區作了勘探並製作了地圖。因此，是鄭和船隊分鯨發現了澳洲。孟席斯新說的最關鍵依據是〈若昂·羅茲（Jean Rotz）地圖〉⁽²⁾。筆者拜讀孟氏大作之後，對該地圖有了一些粗淺的認識，願以就正於方家。

中西航海圖是完全不同的兩種體系

〈羅茲地圖〉在蘇門答臘島的右下方畫著“小爪哇（The Little Java）”島，緊挨著“小爪哇”的下方是“大爪哇（The Great Java）”，兩者之間有一狹長水道相隔。孟席斯認為：“‘小爪哇’，即蘇門答臘南部；‘大爪哇’從接近赤道一直向南極延伸。它的北端，這個大陸有一個伸入海的岬，很像澳洲最北角的約克角（Cape York）。這片大陸的東北部也很像澳洲的東北海岸，但在羅茲海圖上，這片陸地要比實際上的澳洲向東南延伸了很多”⁽³⁾，因此，這“大爪哇”就是澳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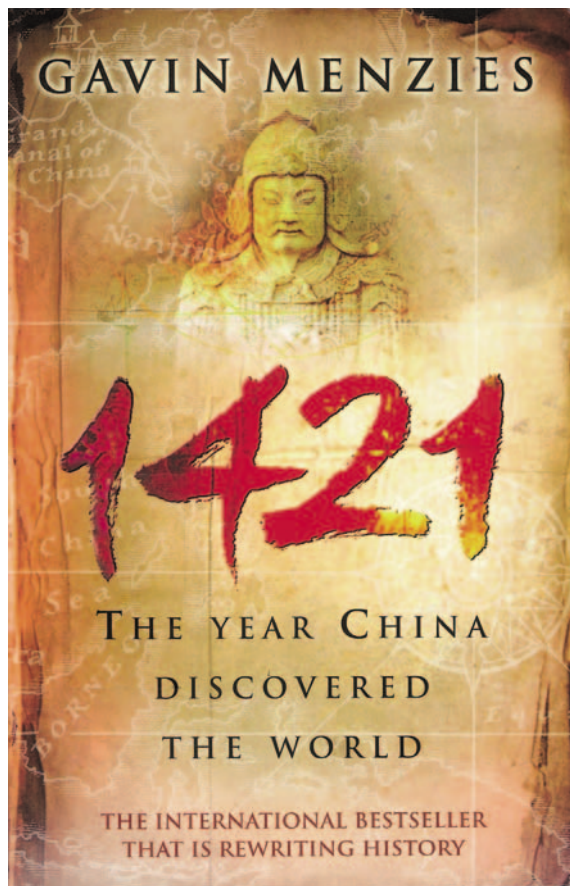
孟席斯對〈若昂·羅茲地圖〉的來歷有如下介紹：“澳洲在皮里·萊斯地圖上沒有標出，但它出現在另一張非常早的地圖，這張地圖為英國圖書館所收藏。該圖是若昂·羅茲所繪製，他被英格蘭的亨利四世任命為‘國王的水文地理學家’，收在羅茲於1542年獻給國王的 *Boke of Idrography* 一書中，比庫克船長發現澳洲早了兩個世紀。羅茲來自製圖的迪耶普學派（Diepe School），該學派以製作的地圖和海圖清晰、準確而譽滿全歐洲。他是他那個時代領先的地圖製作家，以製作新發現陸地的地圖精細而著稱。他沒有發明或造假，在他繪製的海圖上

所表現出的是準確複製他所見的更早的海圖。”⁽⁴⁾孟席斯認為〈羅茲地圖〉上有關澳洲部分不是複製葡萄牙的海圖，而是鄭和船隊分鯨所繪製的地圖，表現的是洪保和周滿船隊在澳洲航海探險路線。

〈羅茲地圖〉真的與鄭和船隊有關嗎？筆者不能不有所懷疑。中西航海圖是完全不同的兩種體系。一些中國學者已指出，古代中國人的世界觀仍停留在天圓地方的觀念⁽⁵⁾，正如1575年出使中國的西班牙傳教士拉達（Martin de Rada）所言：中國人認為“地不是圓的”⁽⁶⁾。因此，早期中國的航海圖不是平面球體的地圖，而是以山水畫形式，用簡單的線條勾勒出航路所經由的島嶼、山體的圖形，配置以有關的航線說明，即包括圖形（圖）和文字（經），謂之“圖經”。如北宋宣和六年（1124）徐兢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該圖已佚，但有經曰：“故其可紀錄者，特山形、潮候而已。……今既論潮候之大概詳於前，謹列夫神舟所經島、洲、苦、嶼而為之圖。”⁽⁷⁾由此可略知其圖之端倪。直至明代，中國的航海圖依然是以山水畫形式，如《日本圖纂》中的〈使倭針經圖說〉亦屬同類性質的航海圖。⁽⁸⁾

鄭和下西洋所用航海圖大體上也是採用中國傳統航海圖的形式。其代表〈鄭和航海圖〉與早期的航海圖相比，雖有了很大的發展，不再依靠航線的文

* 廖大珂，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東南亞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副秘書長，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理事。



孟席斯著《1421：中國發現世界》封面

字說明，而根據實際經驗在航線沿途注明針路，能夠用以獨立指導航海，但仍未擺脫傳統圖形的窠臼。該圖採用我國山水畫筆法，一字展開繪製而成，呈長帶狀，航路、海岸均成平行，不計方向，祇用曲線由右向左引申表示之。“島嶼、山峰等均用‘寫景法’，岸線形狀有的與實際基本相符，有的則是示意性的，與實際出入很大。圖幅無嚴密的比例尺。圖幅方位不同，以航線為中心來配置，可連接成長卷，航線配置在圖幅中央附近，把印度洋兩岸‘擠入’圖幅，印度洋成了‘長廊’形，不能反映水域的真實形狀。”⁽⁹⁾

而歐洲人早在古希臘時期就產生了大地是球形的認識，“引起了大地觀念的一次徹底變化”⁽¹⁰⁾。從公元前3世紀後半期，歐洲人便開始在大地測量中應用經緯度，並繪製地圖。⁽¹¹⁾到16世紀，西方已用經緯

度網取代方向記號（以波托蘭海圖為代表）來繪製地圖，這是一大進步。由於哥倫布和麥哲倫航海的成功，“大地的球形，或者至少在中緯度上成為圓形，連最淺見的人也認為確鑿無疑了。直至當時還可以局限於大地較小部分的地圖，現在必須伸展到除開兩極地方以外的整個地球。”⁽¹²⁾〈羅茲地圖〉是一幅平面球體有經緯度網沒有兩極的世界地圖，表明它是地理大發現的產物，而不可能是鄭和海圖的複製品。除了經緯度網之外，〈羅茲地圖〉在左右兩半球還各有一組以羅盤為中心的三十二條方位線，並附有直線比例尺，用以計算距離，體現了仍保留了波托蘭海圖的特點，這與中國傳統海圖也完全不同。

〈羅茲地圖〉所繪的澳洲北部和東部之精確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其經緯度也大體正確。而鄭和船隊的海圖以“航路為主，各國地勢為附，故圖中所見者，僅為各國海岸之側面且如山水畫，不若現代航海圖利用平面方式，可直接檢視所經諸國全部地域”⁽¹³⁾。尤其是由於缺乏精確的測量條件，沒有嚴密的數學基礎，鄭和海圖不像當時西方海圖那樣採用計里畫方的形式，以致海陸形狀及面積之比例與實際不符合，而相去甚遠。如果〈羅茲地圖〉是複製鄭和船隊地圖的話，如何能將澳洲複製到對應的經緯度？

〈羅茲地圖〉應源於葡萄牙人

孟席斯稱：“〈羅茲海圖〉所顯示的馬來西亞、柬埔寨、越南和中國直到現在的香港，所有道路和所有海岸都畫得極其精確，波斯灣、印度和東南亞也很容易辨識出來。原始海圖祇能是由某些對印度洋、中國和印度支那有熟練知識的人製作的。這樣就可以立即排除了葡萄牙人，因為儘管〈羅茲海圖〉是在麥哲倫環球航行之後製作的，卻不是麥哲倫或在麥哲倫之後在中國沿海默了不很長時間的葡萄牙探險家能夠把它畫得如此令人難以置信地精確。他們的目標是香料群島，他們往更南的馬魯古進發。”⁽¹⁴⁾

此說似與史實不符。1511年葡萄牙人佔領馬六甲後，一方面派遣遠征隊和使團前往馬魯古、暹羅、緬甸和爪哇等地，另一方面揮戈北上，致力於

打開與中國的貿易。1512年8月30日，葡人洛格隆諾(Logronho)致函葡王，提到亞伯奎派遣武裝船隻前往中國邊界探查。同年11月8日，若奧·德·維埃加斯(João de Veigas)報告葡王，若奧·達·莫賴斯(João de Moraes)試圖航行去中國，但由於馬六甲摩爾商人的阻撓而未能成行。⁽¹⁵⁾1514年，葡萄牙人阿爾瓦雷斯(Jorge Álvares)首次抵達中國。葡人巴洛斯(João de Barros)記載：阿爾瓦雷斯乘坐中國帆船於6月抵達廣東珠江口，即香港附近的屯門島(Tamao，即伶仃島)，在那裡豎起刻有葡萄牙王國紋章的石柱。⁽¹⁶⁾1515年，馬六甲司令若熱·德·阿爾布奎克致信葡王，說阿爾瓦雷斯“富有才幹，他以陛下代理商的身份首航中國，他是第一位在那裡樹起皇上旗幟的人”⁽¹⁷⁾。從此，葡萄牙人被中國的財富所吸引，頻頻來到廣東沿海，把屯門作為他們活動的據點，企圖打開古老中國的大門，屯門也因此被葡萄牙人稱作“貿易之島”(Ilha da Veniaga、Beniga、Neniga)。葡萄牙人還在通往中國航線上的馬來半島、印支半島大肆活動，將其作為對中國貿易的跳板或中轉站，甚至以諸國人之名義，“更附諸番舶雜至為交易”⁽¹⁸⁾，藉以掩護對中國的貿易。如葡萄牙人法里亞(António de Faria)、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等人從1537-1558年期間，活躍在從東非、阿拉伯到中國的航線上，多次到過馬來半島、蘇門答臘、爪哇、馬魯古、暹羅、交趾支那、中國、韃靼和日本。⁽¹⁹⁾其實，16世紀上半葉在中國沿海活動的葡萄牙人中，有許多就是來自以上的國家。16世紀40年代，平托造訪浙江雙嶼，說“那裡有許多來自滿刺加、巽他、暹羅和北大年的葡萄牙人。他們習慣在那裡越冬”⁽²⁰⁾。葡萄牙人不僅從事貿易活動，而且也努力收集這些國家的情報，從而很快就掌握了有關國家的許多情況。1511-1517年在東方活動的葡萄牙人皮里士(Tomé Pires)根據所見所聞，撰寫的《東方諸國記》對各國的狀況作了較全面的介紹，其中對〈羅茲海圖〉所顯示的馬來西亞、柬埔寨、越南和中國直到現在的香港所有道路和所有海岸”的介紹尤為詳盡。如他說：“從滿刺加來中國的船都停泊

在屯門，此島距廣州(Canton)20或30里格，這些群島距離陸上的南頭(Nantoo)，由陸地算起約有1里格。”⁽²¹⁾其他葡萄牙人對中國沿海的情況也有詳述，如柯瑞亞於1512年抵印度，著有《印度傳奇》，談到屯門：“此島距廣州18里格，所有商人在此進行買賣……在貿易之島3里格以外的另一島，有中國的艦隊司令或水師把總駐紮。”1528年到印度，並在東方住了十年的康士坦尼達(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所著《葡萄牙人發現並征服印度史》亦提及屯門：“這貿易之島距海岸3里格，中國人稱之為Tamao，沒有廣州政府的許可，任何船隻不能越過這裡靠近海岸，所有交易都在外海或這裡進行。掌管這一帶海防事宜的官叫Pi-o(即備倭都指揮)，他駐在距此島3里格的南頭寨。”⁽²²⁾可見，當時葡萄牙人對通往中國的航線已是輕車熟路，對周邊國家的地理幾乎可稱得上了如指掌。〈羅茲地圖〉對通往中國航路和廣東沿海的精確描繪反映了葡萄牙人在16世紀上半葉的活動，表明它的原始資料應源自葡萄牙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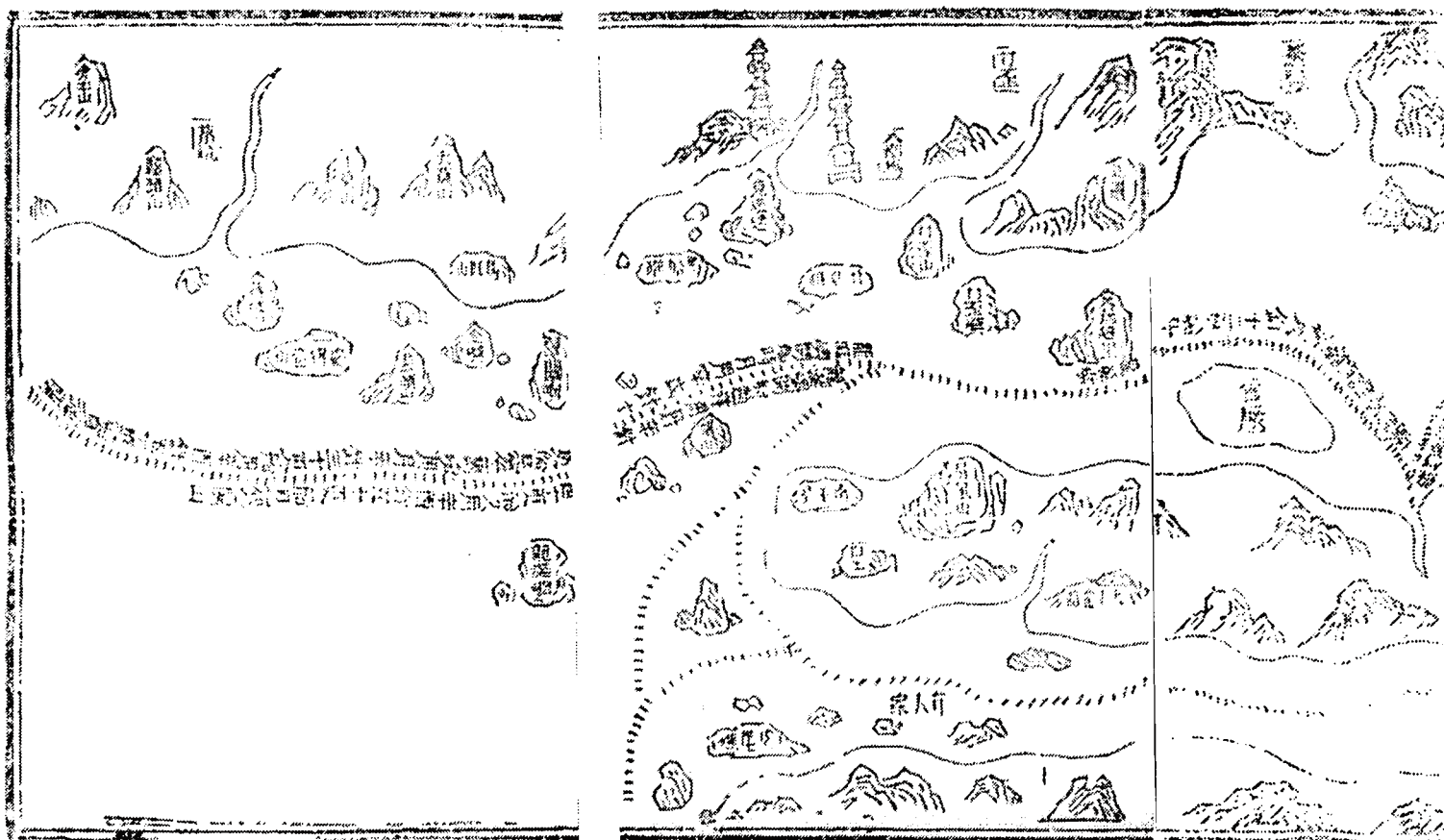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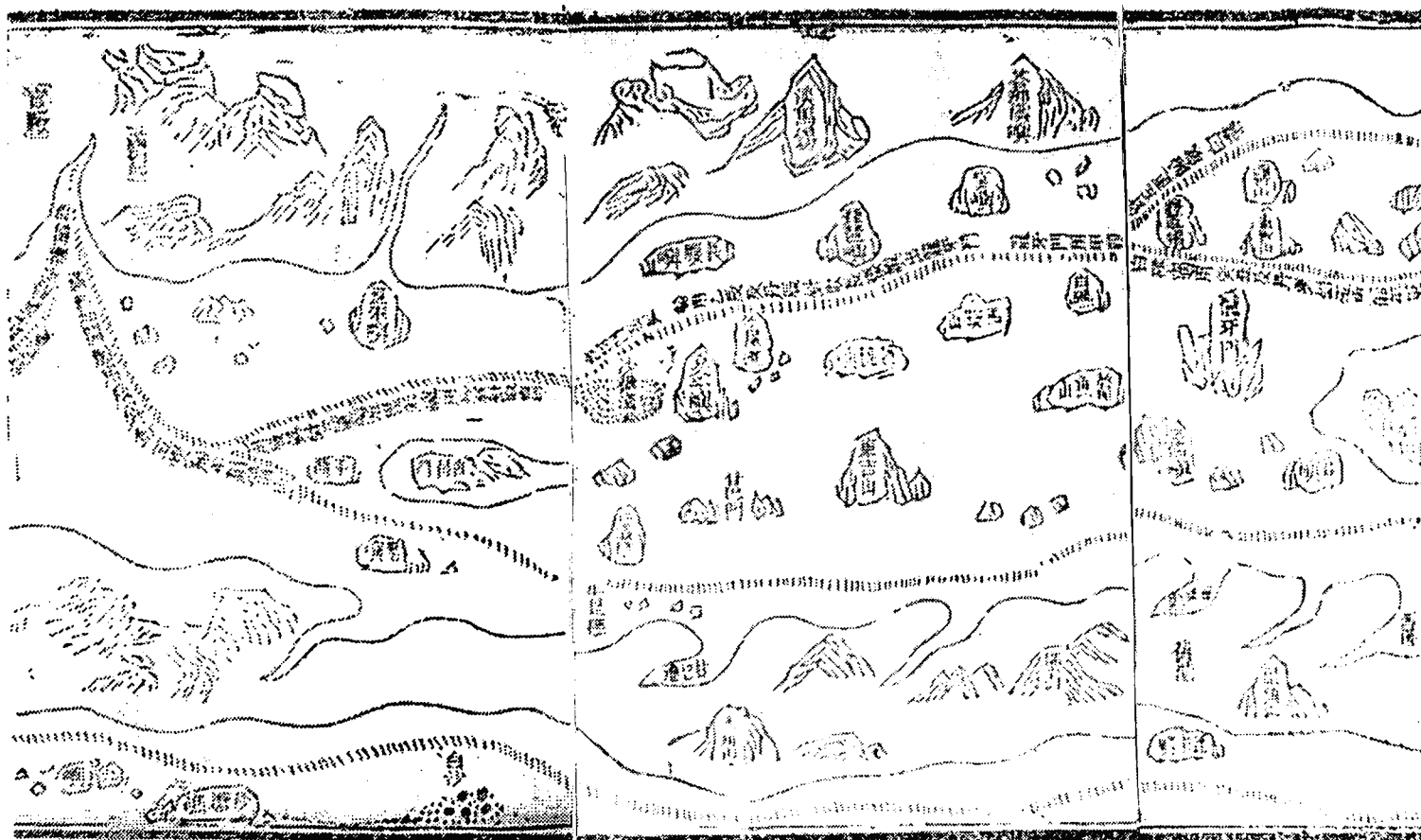
在迪耶普學派地圖中，有多張地圖都繪有標名為“大爪哇”的“澳洲”，〈羅茲地圖〉不過是其中一幅而已。其它的還有：一張約繪製於1530年弗朗西斯一世王朝，供王位繼承人使用的〈德爾芬(Dauphin)地圖〉；三張〈佩德羅·德斯塞列斯(Pierre Desceliers)地圖〉(1536-1550)。在所有這些地圖上都顯示，在巽他群島以南是一塊陸地，它的西海岸和東海岸延伸到地圖的下邊邊緣處，南緯度線很高；祇有在〈羅茲地圖〉上，西海岸的畫線滯留在南緯35°處。很明顯，澳大利亞的西海岸也在同一條緯度線上，突然又折向東。這些地圖所用的地名用語都帶有葡萄牙語的淵源，而北部、東北部和西北部海岸的用語不是葡語，這也顯示出它們應源於葡萄牙人。⁽²³⁾

歐洲人關於南方大陸的傳說已有數千年的歷史。公元前4世紀，古希臘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在繼承前人的理論基礎上提出了大地是球形的學說。他們根據“對蹠說”，即認為世界的一切安排都是對稱性的，斷言赤道以南肯定會有大陸，即第四個世界(他們認為歐、亞、非三大洲是三個世界)，或世界的第四部分。公元2世紀古希臘地理學家托勒密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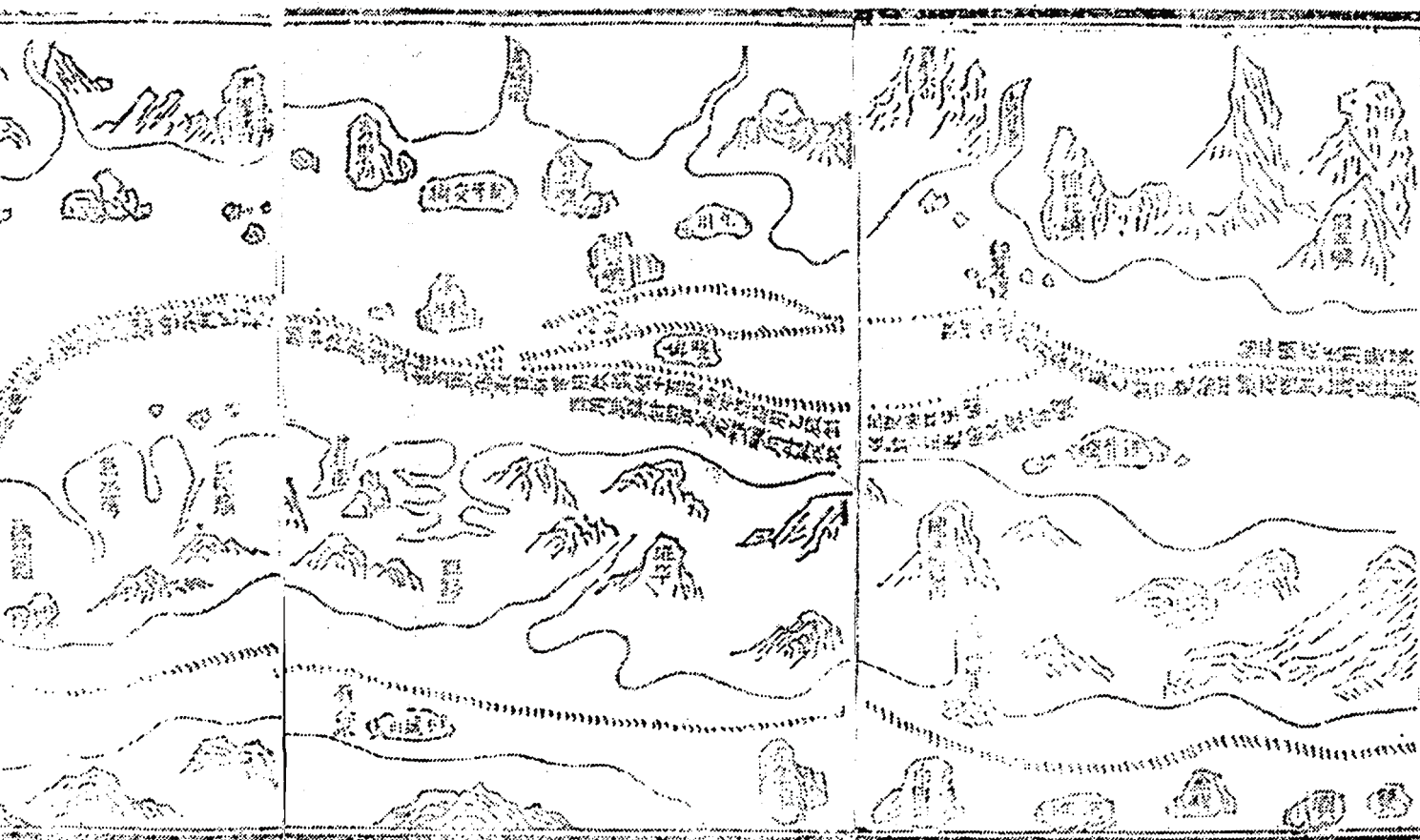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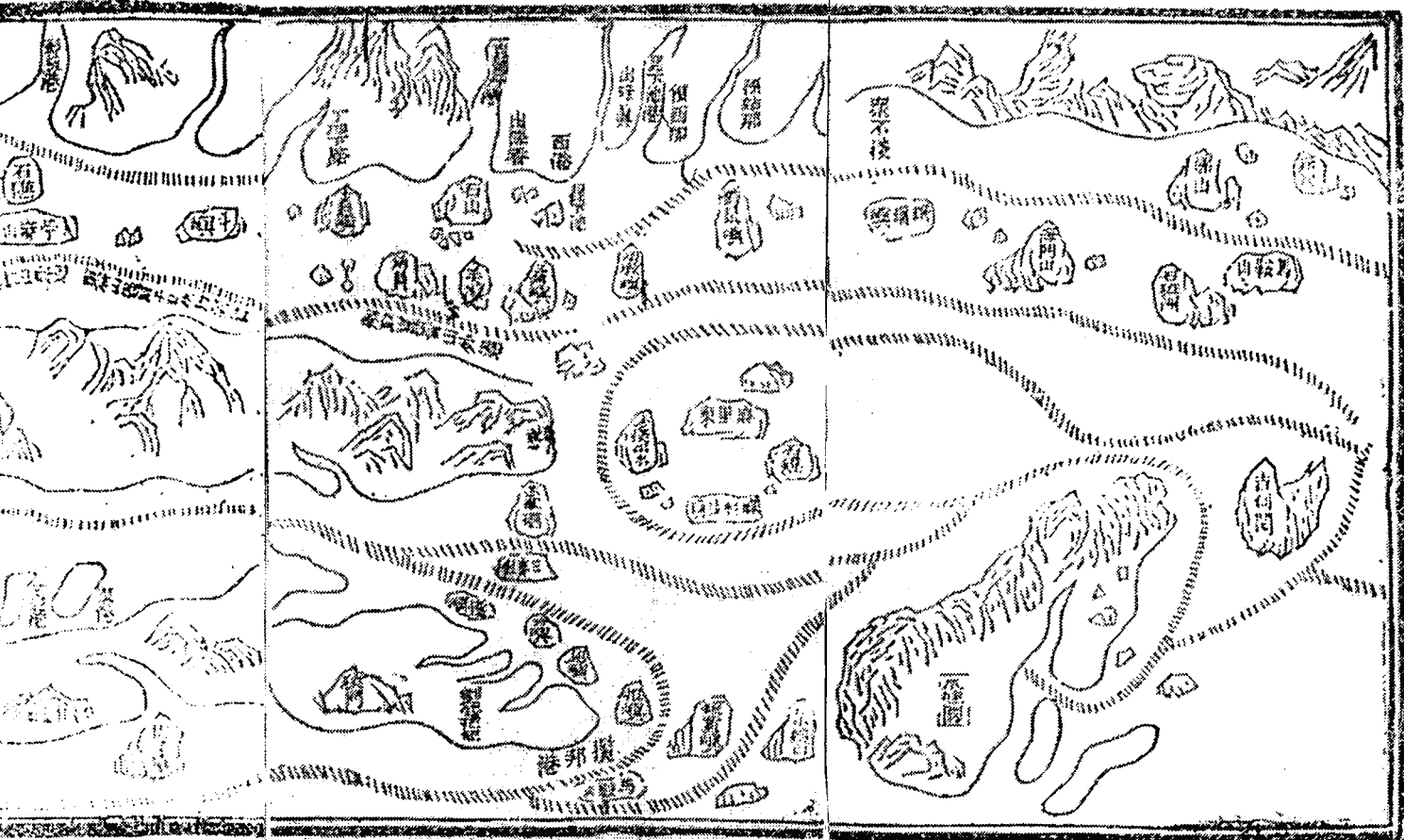


1542 年〈羅茲地圖〉(The Jean Rotz world map, 1542.)





〈鄭和航線圖〉中有關澳洲部分（由《武備志》有關聯頁剪接而成以便讀者觀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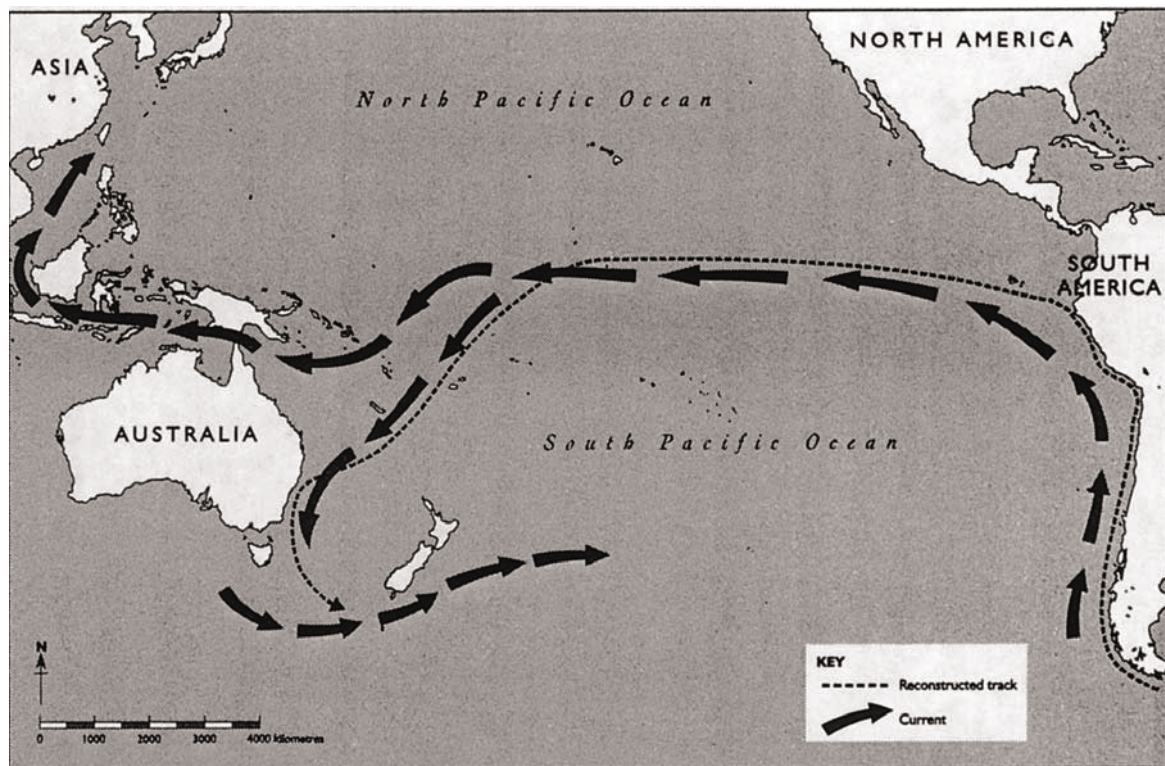
下排右端接上排左端。鄭和航線用“~~~~~”標示。上排左下角及下排所標示的鄭和航線以下為澳洲。)

據“對蹠說”，相信南半球一定存在一個南方大陸來“平衡”在北半球的歐亞大陸，他編寫了《地理志》一書，書中附有世界地圖，在印度洋南面畫有一塊大陸，不知其名，故稱為 *Terra Australis Incognita*，此即“澳大利亞”名稱之緣起，意為“未知南方大陸”。托勒密的地理理論對後世影響極其巨大，從此“未知南方大陸”也廣泛流傳。

葡萄牙人東來後很快就獲悉在亞洲南方存在一片陸地的消息，並認為它就是傳說中的“南方大陸”。亞伯奎於 1511 年攻佔馬六甲後，立即派遣弗朗西斯科·塞爾旺前往馬魯古去“發現”香料群島，翌年塞爾旺到達了馬魯古。在馬魯古，塞爾旺的一名同伴記錄了航海指南，航海指南根據為他們領航的馬來水手所說的情況，估計南方存在着一塊廣闊的陸地，這塊大陸就是“對蹠點”所指的地區。1527 年葡萄牙人讓·阿爾豐斯·德賽恩東格撰寫了《航海歷險記》，書中提到：“麥哲倫以南的陸地繼續向西，直至歐菲耶島（弗洛雷斯島或帝汶島？），位於爪哇島附近和馬魯古群島西南，在南緯 7°；從這裡

起，海岸被叫做爪哇海岸，繼續往西和西偏西南直至蘇門答臘的緯度，繼續向西南和南偏西南。”⁽²⁴⁾ 德賽恩東格關於爪哇海岸的說法與迪耶普學派的地圖關於“南方大陸”的觀念是一致的。〈羅茲地圖〉作於 1542 年，距葡萄牙人東來已三十年，在圖中標有“南方大陸”實不足為奇。此後，在更多的葡萄牙人和荷蘭人繪製的地圖（如著名的墨卡托地圖，1569 年）中，也都出現了“南方大陸”。“事實上，在 16 世紀的許多地圖中，南半球地區佔據一片廣闊的大陸，一直延伸到好望角以南，最後延伸到東部，接近麥哲倫海峽，到達火地島的所在地，其緯度接近巽他群島。”⁽²⁵⁾

關於這些地圖上“南方大陸”的來源和依據有兩種說法。一種認為，作者根據古代關於南方大陸的地圖和傳說，經過本人的想象而繪製出來的，但這不能完全解釋為何地圖上的南方大陸的海岸與澳洲北部的海岸線如此相似。另一種認為，作者是依據葡萄牙人的航海圖志和航海日記繪製出來的。因為在英國，16 世紀“一直有葡萄牙領航員和繪圖員為英國効力”；在法國，“整個 16 世紀期間有不少葡



孟席斯所畫周滿船隊航行澳洲圖

葡萄牙領航員和繪圖員為法國人工作”。⁽²⁶⁾從這些地圖繪製的年代和地形像澳大利亞北部來看，葡萄牙航海家很可能看到過澳大利亞北部，是否上過岸就不敢肯定了；“要作出葡萄牙人發現澳大利亞的肯定結論，這些文件還不夠，還缺乏其它歷史資料的支持。”⁽²⁷⁾但是無論葡萄牙人是否發現澳洲，〈羅茲地圖〉與鄭和航海都沒有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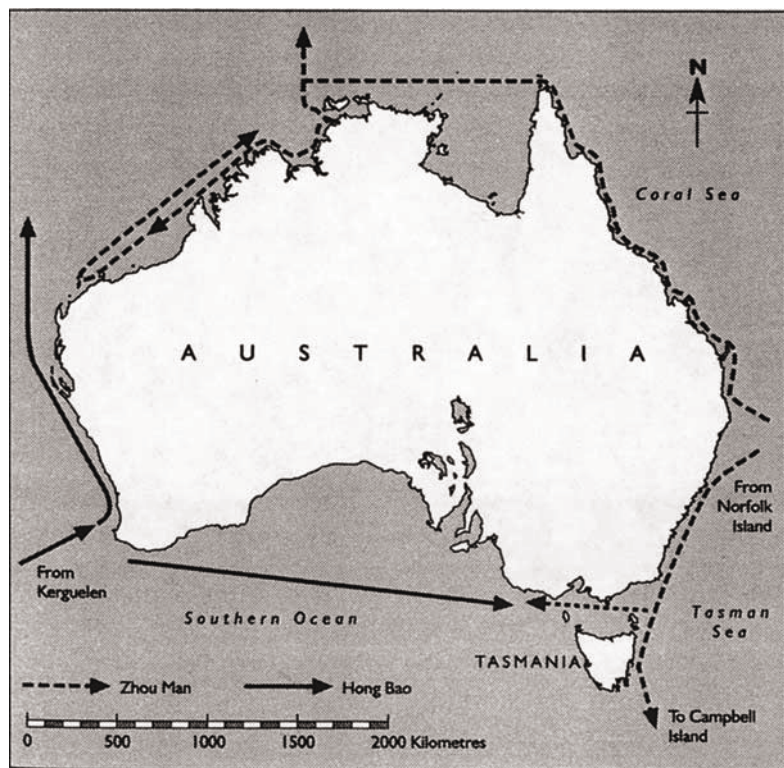
〈羅茲地圖〉上的“大爪哇”與“小爪哇”

〈羅茲地圖〉上的“大爪哇”和“小爪哇”，實際上反映了當時歐洲人對爪哇島和南方大陸的混亂認識。爪哇（Java）之名起源甚早，印度史詩《羅摩衍那》就提到 Yavadvipa 的地名，今 Java 之名乃從此梵語所轉出，意為栗島，托勒密《地理志》作 Iabadiu，阿拉伯人作 Jawa、Jawi，其所指地望或為今爪哇抑或蘇門答臘，甚或可視為馬來群島之總稱。⁽²⁸⁾自劉宋以來，在中國古籍中，Java 譯稱閩婆，至元時除沿稱閩婆外，始稱爪哇，遂沿用至今。

閩婆之名，在唐代以及以前，似為蘇門答臘、爪哇二島之合稱，至宋代始為今爪哇之專稱。中國載籍無小閩婆卻有大閩婆之名。趙汝適《諸番志》曰：“打板國，東連大閩婆，號戎牙路，或作重迦盧。”⁽²⁹⁾陳元靚《事林廣記·方國類》則稱，大閩婆國名重迦羅。陳大震《大德南海志》作重伽蘆。⁽³⁰⁾汪大淵《島夷志略》亦云：“重迦羅，與爪哇界相接，”⁽³¹⁾《元史·爪哇傳》作戎牙路。戎牙路、重迦盧、重伽蘆、重迦羅皆為 Janggala（今 Surabaya）之對音，可見中國載籍中的大閩婆指爪哇島的東部。

阿拉伯人之 Jawa、Jawi 雖用以稱馬來群島，但多指蘇門答臘。1345年和1346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經過蘇門答臘，謁見了“爪哇的蘇丹”麥里克·雜希爾⁽³²⁾，麥里克·雜希爾即北蘇門答臘的蘇丹。“大爪哇（Great Java）”和“小爪哇（Little）”最早是阿拉伯人分別用來指稱爪哇島和蘇門答臘島的。⁽³³⁾大概是受阿拉伯人的影響，中世紀遊歷家也用“大爪哇”和“小爪哇”來稱呼爪哇和蘇門答臘。1291年，馬可·波羅乘船離開泉州返回意大利，途

經馬來群島，談及“大爪哇島（Great Island of Java）”：“自占婆向南和東南航行1500哩，抵一大島，名曰爪哇。據此國有經驗之水手言，該島為世界最大之島，周圍逾3000哩。”⁽³⁴⁾此“大爪哇”即爪哇島。又談及“小爪哇”：“自賓坦（Pentam，蓋今新加坡）島航行約100哩，則抵小爪哇島（Island of Java The Less），雖以小名，其實不小，周圍逾2000哩也。”⁽³⁵⁾此“小爪哇”即蘇門答臘島。鄂多立克記云：“與那個國家（蘇門答臘）相鄰的是一個大島（今爪哇），名叫爪哇，它周圍足有三千英里。”⁽³⁶⁾直至1516年，葡萄牙歷史學家巴博沙（Barbosa）還寫道：“那裡有大大小小的許多島



孟席斯所畫洪保和周滿船隊環繞澳洲航線

嶼，其中一個非常大的島叫作大爪哇（Java the Great）。……人們說這個島是世界物產最豐富的國家，……出產胡椒、肉桂、薑、筍、華澄茄和黃金。”⁽³⁷⁾胡椒、肉桂、薑、筍、華澄茄是爪哇在那個時代的主要出口商品，而澳洲並無這些產品，巴博沙筆下的大爪哇無疑就是今爪哇了。甚至到了17世紀後期，荷蘭人在遠東航行，仍將爪哇稱為“大爪哇（Great Java）”⁽³⁸⁾。由此可見，早期西方人所說“大爪哇”是指今爪哇島，而“小爪哇”是指今蘇門答臘島，兩者皆非指澳洲。因此，“威尼斯人孔蒂（Niccolo Conti）告訴羅馬教皇的秘書波焦·布拉喬利尼（Poggio Bracciolini），他乘一艘中國人的船登上大爪哇（Greater Java），在那時與妻子生活了九個月。”⁽³⁹⁾孔蒂所登陸的大爪哇應是今爪哇，而不是澳洲，他的記述不能證明鄭和船隊曾航抵澳洲。

值得一提的是，馬可·波羅所說大爪哇周圍逾3000哩（沙利昂 A. H. Charigon 的法文譯注本作5000哩⁽⁴⁰⁾）將事實誇大了兩倍，鄂多立克和孔蒂也是這麼描寫的。“無疑這是阿拉伯水手之間的一種傳說，他們從未訪問過爪哇的南海岸，過份地誇大了爪哇南海岸的範圍。”⁽⁴¹⁾

然而，對〈羅茲地圖〉上的“大爪哇”和“小爪哇”該如何解釋？筆者認為：葡萄牙人東來後，對蘇門答臘已有較清晰的瞭解，自然不會誤認為是爪哇，〈羅茲地圖〉對該島的

描繪基本上是準確的。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葡萄牙人祇在爪哇北海岸航行，未到過南海岸，對爪哇島就不甚了了。甚至在16世紀末，曾隨葡萄牙遠征隊到東方著有《航海史》的荷蘭人林斯霍滕（Linschoten）說：“爪哇島的寬度至今尚未得知，某些人想象它是相對着好望角延伸的南方大陸（Terra Australis）的一部分，然而一般認為它是一個島嶼。”“1777年，在里斯本出版的一份巴洛斯（De Barros）作的古地圖上，在爪哇的南邊被注上‘爪哇的未知部分’，並無一個地名，同時一



（明）茅元儀《武備志》之〈龍涎嶼往錫蘭過洋牽星圖〉

條狹窄的海峽從右穿過該島（假想巽他與爪哇本土分割開來）。”⁽⁴²⁾ 出於對爪哇島的不瞭解，他們把阿拉伯人或中世紀遊歷家的“大爪哇”和“小爪哇”都放在蘇門答臘島的右下方，並認為它們就是傳說中或想象中的“南方大陸”⁽⁴³⁾。因為“古代地理學的一派假定存在這個大陸，用以保持地球的平衡——盤據在人們的頭腦中，於是把它當作亞洲的分支。”⁽⁴⁴⁾ 〈羅茲地圖〉正是當時歐洲人這種混亂認識的體現。正如葡萄牙史學家雅依梅·科爾特桑所指出：“北緯終端、與蘇門答臘島

相對的位置、爪哇島的名稱以及同該島合二而一的想法，都源自把一個來源並入其它來源，或者把那些描述和地理圖統歸為一個共同的來源。結論：把南半球的陸地與爪哇島混為一談，其結果是使此陸地的位置移到了蘇門答臘東南。這些都先於迪耶普學派最早的地圖，而這些本已錯誤的概念又重新出現，第一次出現在葡萄牙航海者的文本之中。”⁽⁴⁵⁾

至於〈羅茲地圖〉上大爪哇所畫的很像澳大利亞的西海岸和東南海岸，“史學家還是接受了下述事實，即葡萄牙人在向東的旅行中偶然望見了澳大利亞的西海岸和南海岸。但是，他們不接受葡萄牙人發現了澳大利亞是不容爭議的歷史事實的說法。”⁽⁴⁶⁾

結語

綜上所述，〈羅茲地圖〉與鄭和下西洋沒有關係，把它作為鄭和船隊發現澳洲的依據難以令人信服。不過，〈羅茲地圖〉也引發了人們對更深層次問題的思考：中國和西方的地圖屬於不同的繪製體系，到底它們是各自獨立發展抑或相互影響？〈鄭和航海圖〉與〈羅茲地圖〉所描繪的澳洲北部海岸確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表明西方人東來過程中曾利用了中國人的航海知識也是有可能的。同時，〈鄭和航海圖〉祇畫出澳洲北部海岸，而其以南部分則未畫出，與〈羅茲地圖〉幾乎是一致的，這是否表明古代中國地圖也受歐洲人關於南方大陸的傳說所影響？因此，我們應加強中外地圖尤其是海圖的研究，對這種中外相互影響給予客觀、公正的評價。



明代的門艦（見《三才圖會》）

【註】

- (1) Gavin Menzies,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Inc., New York, 2004.
- (2) 〈羅茲地圖〉見 Gavin Menzies,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 頁 352-353 之間的插圖。
- (3) (4) Gavin Menzies,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 p. 187; p. 186.
- (5) 時平：〈千帆競渡，百家爭鳴，共同繁榮鄭和研究〉，載《鄭和研究》2003 年專刊，總第 50 期。
- (6) 拉達：〈記大明的中國事情〉，見 C. R. 博克舍編注，何高濟譯：《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中華書局 1990 年版，頁 210。
- (7) 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四，〈海道〉，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593 冊，頁 891。
- (8) 胡宗憲：《籌海圖編》卷四，〈日本圖纂〉，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584 冊，頁 549-552。
- (9) 朱鑒秋：〈〈鄭和航海圖〉與同時期西方海圖的比較〉，載《鄭和研究論文集》第 1 輯，大連海運學院出版社 1993 年版，頁 406。
- (10) (11) (12) [德] 阿爾夫雷德·赫特納：《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和方法》，商務印書館 1997 年版，頁 17；頁 24；頁 62。
- (13) 徐玉虎：《明鄭和研究》，高雄：德馨室出版社 1980 年版，頁 66-67。
- (14) Gavin Menzies,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 pp. 186-187.
- (15) 引自萬明：《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明與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較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0 年版，頁 180。
- (16) 轉引自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華書局 1988 年版，頁 38。
- (17) J. M. Braga, "The 'Tamao' of Portuguese Pioneers", *T'ien Hsia Monthly*, Vol. VIII, No. 5, (May, 1939), p. 432.
- (18)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九，〈佛郎機〉，頁 324。
- (19) Cf. Henry Cogan (tr.), *The Voyages and Adventures of Ferdinand Mendez Pinto*, London, 1890.
- (20)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著，金國平譯：《遠遊記》，澳門，1999 年版，頁 162。
- (21) Armando Cortesão,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é Pires*, London, 1944, p. 123.
- (22) 引自張增信：《明季東南中國的海上活動》上編，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88 年版，頁 277。
- (23) 孟席斯也說：“人們通常認為，是羅茲和他的時代其他的迪耶普製圖家複製了要早得多的葡萄牙海圖。”(Gavin Menzies,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 p. 186.)
- (24) (25) (27) [葡] 雅依梅·科爾特桑：《葡萄牙的發現》，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1997 年版，第 5 卷頁 1277-1278；頁 1275；頁 1273。
- (26) [葡] 雅依梅·科爾特桑：《葡萄牙的發現》，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1997 年版，第 6 卷頁 1417-1148。
- (28) (37) Henry Yule, *Hobson-Jobson, A Glossary of Anglo-Indian Colloquial Words and Phrases and of Kindred Terms, Etymological,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and Discursive*, London, 1903, Vol. II, pp. 454-455; p. 455.
- (29) 趙汝適原著，韓振華補注：《諸蕃志注補》卷上，〈蘇吉丹〉，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2000 年版，頁 101。
- (30) 陳大震：《大德南海南志》卷 7，《宋元方志叢刊》，中華書局 1990 年版，第 8 冊，頁 8432。
- (31) 汪大淵：《島夷志略·重迦羅》，中華書局 1981 年版，頁 168。
- (32) 馬金鵬譯：《伊本·白圖泰》，寧夏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頁 537。
- (33) (34) (35) Henry Yule, *The Book of Sir Marco Polo*, London, 1926, Vol. II, p. 286. Note 1; p. 272; p. 284.
- (36) 何高濟譯：《海屯行紀、鄂多立克東遊錄、沙哈魯遣使中國記》，中華書局 1981 年版，頁 56。
- (38) Christopher Fryke & Christopher Schweitzer, *Voyages to the East Indies*, First Published in 1700, Reprinted in the Seafarers' Library, London, 1929, p. 108.
- (39) Gavin Menzies,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 pp. 228-229.
- (40) 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0 年版，頁 398。
- (41) (42) Henry. Yule, *The Book of Sir Marco Polo*, London, 1926, Vol. II, p. 274, Note 1.
- (43) 1569 年，曾經居住在馬魯古群島的葡萄牙人加布里埃爾·雷貝洛 (Gabriel Rebelo) 描述印尼群島這一部分的文章中寫道：“根據已知的有關這些島嶼的情報，島嶼沿着一塊大的陸地走向，這似乎是一塊南部的想象的大陸，它的東西兩側是麥哲倫海峽。”([葡] 雅依梅·科爾特桑：《葡萄牙的發現》第 5 卷，頁 1275。)
- (44) [德] 阿爾夫雷德·赫特納：《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和方法》，商務印書館 1997 年版，頁 63。
- (45) (46) [葡] 雅依梅·科爾特桑：《葡萄牙的發現》第 5 卷，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1997 年版，頁 1278；頁 1276。